

中韩自贸区:11万亿美元共同市场

■王晓薇 报道

天坛、APEC会议中心、烟火、中国结——11月10日,这些元素占据了《人民日报》四个整版版面。这是三星、现代、浦项和SK海力士四家韩国企业为欢迎韩国总统朴槿惠来北京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刊登的广告。

然而,在这一欢迎意味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则是韩国企业对于朴槿惠来华访问获得重要成果的期待之心。

朴槿惠果然不负众望。

在当天稍后举行的中韩领导人会晤中,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通商产业资源部部长尹相直签署了结束中韩自贸区(FTA)实质性谈判的会议纪要。

中国与韩国的此次合作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亚太贸易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作为中国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构想以来达成的第一个FTA,遵循“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等标准所签订的中韩FTA或将成为创立FTAAP的“试验田”。

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中韩FTA是目前中国对外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中覆盖领域最广、涉及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据韩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额为2289.2亿美元。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458.7亿美元,自中国进口830.5亿美元。自1993年以来,韩国一直对中国保持着贸易顺差的优势,而这一顺差在2013年突破了500亿美元,达到了628.2亿美元。作为互补性较大的两个经济体,中韩之间达成FTA将对两国的贸易量提升起到显著的“催化作用”。

按照FTA原则,和韩国对其FTA伙伴国的关税优惠协定,签署FTA的双方国家要赋予对方最优惠国免税待遇。

在FTA签署后,双方贸易自由化比例将超过“税目的90%,贸易额的85%”。按照中韩达成的FTA,一旦协定生效,韩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将有91%商品在20年内撤销关税,其规模达到1417亿美元。

“中韩FTA的达成将可以加速韩国企业尤其是韩国中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竞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室室长禹泰姬说。据预测,在中小企业中,收益中韩FTA签署的行业将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服装、小家电等产品领域。而由于韩国的大型企业,三星、现代等早已实现中国本土化生产,因此在税率上所享受的优惠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改变,但是中韩FTA达成的良好气氛,以及中国对韩国企业的政策倾斜则有可能促成更多的韩国企业进一步增加对中国投资,加强其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

除在贸易广度上有所扩展外,中韩FTA的达成还将为加深双边的贸易深度提供空间。继今年夏天中韩之间展开人民币对韩元的直接交易后,11月11日,韩国财政部副部长Jung Eunbo透露,中韩双方将就在韩国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可行性进行讨论。韩国已经指定交通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行,该行将负责人民币的存款和结算业务。中国也已经允许韩国机构投资者买入至多800亿元的股票和债券。Jung表示希望中韩双方可以在2015年就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签署正式协议。而该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为扩大中韩贸易提供便利条件。

就在中韩FTA达成当天,出于对中韩自贸协定的乐观期待,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与前一天相比上涨了0.95%。而刊登祝贺朴槿惠访华的三大韩国企业股价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其中三星电子的涨幅更是达到了5.14%。

有预测指出,中韩自贸区一旦建成,预计对中国GDP增长将贡献1-2个百分点,而韩国GDP将增加2%-3%,届时,中韩之间所形成的将是一个人口高达13.5亿、GDP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一石二鸟

中韩FTA的达成除惠及双边经济之外,对于当前正处于“微妙期”的亚太各经济体之间达成新的贸易合作还将具有模板意义和示范作用。

早在中韩达成FTA谈判前,在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之间,一个名为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1年,然而随着日本在二战遗留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这一原本可以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自由贸易区匹敌的自贸区谈判陷入了停滞。

伴随着中韩FTA的达成,人们又一次将希望投射在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之上,尤其是在11月10日,中日首脑实现双方就任国家元首之间的第一次会见后,此种愿景实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11月底在日本东京将举行关于中日韩自贸区的第六轮谈判。三方谈判小组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在现有的11个工作小组外,中日韩三方还表示将会把电子商务、环境等议题也纳入协定并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作为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的21.9%,亚洲的70%,但是三者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却只有19.4%,这一指标远远低于欧盟的63.8%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0.2%。横亘在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让这三个亚洲邻国近来渐行渐远。“中韩自贸区的达成或将对日本积极投入谈判起到推进作用,”首尔的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Suh Dong-hyuk说。“因为在贸易结构上,日本与韩国有很大的相似度,一旦中韩自贸区启动,日本对华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这种影响,安倍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正当中韩达成FTA之际,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棋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陷于停滯。而中韩FTA的达成,为美韩自贸协定提供了“求同存异”的路径。

在成为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模板的同时,中韩自贸区也在有意或是无意间成为了改变地区贸易流向的“搅拌棒”。

因受中韩FTA协定冲击,中国台湾在大陆将有约400亿美元的产品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根据中韩FTA谈判内容,韩国在朝鲜境内所设立的开城工业园区所生产的产品也将被列入关税减免名录,这将有望大幅提升开城工业园区的出口竞争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10年未果、多边贸易体制运行受阻的情况下,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被视作是破解国际贸易争端的一条捷径。而中韩自贸区的快速达成则为打算尝试或者已经踏上这条捷径的各经济体提供了一种参考。

入了停滞。而参与谈判的日本在关于农业、渔业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则成为了该协定迟迟无法达成的关键因素。

11月11日,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内,奥巴马与参与该协定的其他11个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大约一小时的会谈。之后白宫发布了一份没有细节的乐观声明。声明称,随着TPP协定达成有望,要求各位部长和谈判人员将达成协议作为首要任务。然而,鉴于关键领域的谈判仍处于非正式会谈期,美国也同时承认协定最早签署也要等到2015年。

当TP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均处于僵持时刻,中韩FTA的达成成为了打破这一潭“死水”的“石子”。中韩FTA的达成不仅成为了促发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速的“催化剂”,还成为了中国突破TPP“包围”的“突破口”。

韩国一直都是美国所主导的TPP协定争取的重要目标,而抢在TPP达成之前,签署中韩FTA,不仅会让中国获得更多自由贸易商的利益,也会赢得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因而加快中韩FTA的谈判也成为了双方工作的重点内容。

中韩FTA的谈判开始于2012年5月,而在习近平与朴槿惠在今年7月会晤时就已经同意在今年年底签署协定。两年的时间达成一份自贸协定,无论是在中国对外自贸区谈判纪录中,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贸区协定的签署过程中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为了推动中韩FTA的达成,双方在分歧较大的农产品领域和服务业领域采取了“负面清单”模式也从另一个侧面为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以及未来亚太自贸区的谈判提供了“求同存异”的路径。

在成为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模板的同时,中韩自贸区也在有意或是无意间成为了改变地区贸易流向的“搅拌棒”。因受中韩FTA协定冲击,中国台湾在大陆将有约400亿美元的产品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而根据中韩FTA谈判内容,韩国在朝鲜境内所设立的开城工业园区所生产的产品也将被列入关税减免名录,这将有望大幅提升开城工业园区的出口竞争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10年未果、多边贸易体制运行受阻的情况下,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被视作是破解国际贸易争端的一条捷径。而中韩自贸区的快速达成则为打算尝试或者已经踏上这条捷径的各经济体提供了一种参考。

“这跟市场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省会一般都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政权力影响更大,非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各种资源都比较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省份的省会依赖度都很高,像中部的太原和郑州占比均不到20%。其中河南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下辖18个地级市,因此省会GDP占比相对较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只有16.1%,目前呼和浩特的经济总量在内蒙古仅列第三,与排名前两名的鄂尔多斯和包头均有一定距离。

省会依赖度日益突出 中西部尤其

■林小昭 报道

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也不低。不过,各省情况差异也比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

省会依赖度:中西部高于东部

如果一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则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则说明依赖度较高。

记者通过对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的省会经济占比统计发现,有15个省份的省会占比超过了1/4,有10个省会占比超过了30%。

其中,宁夏的银川和青海的西宁占比均达到51.6%。

此外,省会依赖度靠前的是吉林和黑龙江两个东北省份,其中吉林的长春占比达到41.2%,哈尔滨占比达到38.34%。中部的湖北武汉和西部的四川成都依赖度也比较高,武汉占比达到35.95%,成都占比达到35.4%,均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属于典型的“一城独大”。

为何这几个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比较高?这是因为几个城市包括西安作为中西部的副省级省会,行政级别较高,对周围的吸引力更强,不少大型工业项目均布局于此。

武汉和成都作为华中大区和西南大区的中心城市,其教育、医疗、交通区位等都是最好的,对经济资源的吸附力也最强。

此外,像昆明、兰州、长沙、贵阳等几个中西部省会在各自省份的经济体量占比也比较高。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记者分析指出,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省内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都集中在省会城市。

“这跟市场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省会一般都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政权力影响更大,非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各种资源都比较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省份的省会依赖度都很高,像中部的太原和郑州占比均不到20%。其中河南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下辖18个地级市,因此省会GDP占比相对较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只有16.1%,目前呼和浩特的经济总量在内蒙古仅列第三,与排名前两名的鄂尔多斯和包头均有一定距离。

沿海:普遍低于1/4

相比之下,沿海省份的省会依赖度普遍较低,比如广州虽然是全国经济第三城和国家中心城市,不过其占广东省的比重也仅为24.79%,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福州占比也分别只有23.1%和20.59%。

彭澎分析,相比内陆,沿海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地方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此外,沿海的城市群发展态势比较好,城市密度大,基础设施比较好。很多沿海非省会城市有机场、港口、高铁,发

展条件也十分好。

比如,在福建,厦门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是福州机场的两倍以上,青岛机场吞吐量比济南机场多出80%,大连机场的吞吐量也比沈阳机场来得高。

在经济发展方面,沿海省份一般都有“双子星”现象,比如广州与深圳,福州与厦门,济南与青岛、沈阳和大连等。

占比最低的省会分别是来自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南京和济南这两个沿海副省级省会分别只占所在省份GDP的13.63%和9.87%,占比最低的原因是这两个沿海经济大省下辖地级市众多,省内还有其他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

例如,多年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今年前三季度,南京经济总量才首次超过无锡。不过,其与第一的苏州差距仍较大。

然而,济南要甩掉“鲁小三”的帽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在山东17个地市中,济南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第一名的青岛的65%,也比第二名的烟台落后了400亿元左右,其占全省的比重仅为9.87%,是全国唯一一个GDP占该省比重低于10%的省会城市。

省会依赖度日益突出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近年来,省会城市经济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均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例如,前三季度,贵阳实现GDP1741.98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比全国、全省分别高6.5个、3.2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达28.2%,比去年提高2.2个百分点。

再比如,2010年,长沙占湖南全省的比重是28.5%,今年前三季度已经提高到30.72%;合肥在2010年时占全省的比重为22.4%,如今已经提高到23.44%。

占比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不断加快,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省会城市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首选。例如富士康在内陆省份投资中,就大多布局在太原、武汉、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

彭澎称,在中西部省份中,一般只有省会才有大型的国际机场,其他地方机场都很小。“从省会出发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的地级市,很多大型公司就不会去。当然在高铁大发展后,一些有高铁的普通地级市也会迎来比较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外贸出口受阻的情况下,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投资和扩内需。2008年以后的4万亿投资大潮中,基建投资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而省会城市在这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认为,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省会城市对包括土地、科技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更强,因此他们近年来发展更迅猛也是必然。

胡晓登说,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都会选择在省会投资。此外,近几年,资金、人口进一步向直辖市、省会城市集中,经济发展也持续“生猛”。

珠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新方向

■林小昭 报道

在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之后,哪个跨省份的经济带广受关注?珠江经济带是其中一个。

今年以来,高层重点推出的几大区域——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均体现了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新方向,即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调发展。

大西南新机遇

与长江一样,珠江也是横贯东西,连接沿海与广袤的内陆。

因此,建设珠江经济带,可以构建一个由港澳珠三角与西南地区相互支撑、产业互动的格局,让东部与西部的产业要素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化集聚发展。

珠江干流总长度2197公里,范围主要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流域总面积45.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71%,全流域航运量占全国内河航运量的20%左右。

记者统计,珠江经济带的行政区划面积50.7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面积略大于流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5.28%,总人口超过了2.4亿。2013年,四省份GDP合计96630亿元,占全国的17%左右。

此外,珠江经济带内包括了珠三角、北部湾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和滇中经济区四大经济区,以及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贵州贵安新区等多个国家级发展平台。

在过去尤其是2008年以前,珠三角与大西南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不那么紧密,一方面,珠三角凭借着地理位置和人口红利等优势,经济迅速崛起,彼时珠三角传统的发展模式尚未到尽头,因此两者之间的产业互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大西南地区山多地少,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京广线贯穿其中的湖南、湖北与广东之间的联系较弱。

但200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对记者分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很高,土地资

源越来越稀缺,所以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组装产能必须向中西部转移,寻找新的空间。只有这样,东部才能释放出一些空间,发展新兴产业。

同时,不少中西部地区资源和劳动力也比较丰富,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具备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可以加快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吸引农村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加快当地城镇化的进程。

“高铁通车后,贵州与广东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有很多产业将会转移到这边来。”贵州当地一家地产企业人士告诉记者,在产业转移后,城镇化水平最低的贵州将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对住房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除了陆路交通,西江这条黄金水道目前仍有很多潜力可挖,通过发展西江航运,让沿海的集装箱可以溯流而上到达广西。

以“江南煤海”贵州为例,贵州的煤炭储量在全国排名前五,相当于南方12个省煤炭储量的总额。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拥有经济、技术人才优势,但资源短缺,每年就

需调入近2亿吨煤炭。如果能够通过珠江水运,就可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

跨区域如何共赢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说,在一系列高速公路、高铁贯通后,目前已经具备了打造珠江经济带的条件。

无论是推动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还是拉动云贵、广西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作用都很明显。

与此同时,在我国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中,珠江经济带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011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对云南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彭澎告诉记者,从目前来看,在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单靠广西的力量显然不够,如果把广东与广西、云贵结合起来,更有利与东盟合作,以及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目前,珠江流域范围内的广东和广西之

间的跨区域合作已经